

# 印度圣哲 精神大师

## ——室利·阿罗频多

默 生

笔者去年在印度访学时曾在印度报章中看到这样的新闻：新近落成的室利·阿罗频多的塑像被安放于印度国会大厦的显要位置。这一举动充分说明了室利·阿罗频多在当今印度社会中的地位之尊。在印度大学的图书馆中翻阅博士论文目录，你会经常看到以室利·阿罗频多的哲学思想作为研究课题的，有将他的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的，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有将他的哲学思想与中国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的，并且不只一篇，我斗胆放言：中国的博士论文目录中一定没有此类题目。

室利·阿罗频多是当代印度一位精神哲学大师，平生著作丰富。在其百年诞辰纪念时，已出版其作品集三十巨册。“室利·阿罗频多不是宗教领袖，他是综合自韦檀陀（现译吠檀多。——引者注）以下之精神哲学而集其大成者，超出了韦檀多学的范围，度越前古。”（《玄理参同序》）事实上，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早在上一世纪已经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由于他的主要著作均以英语写作，因此英语世界早已接受了他的思想并对其多有研讨，他的主要著作以后陆续被译成法文、德文出版，欧美地区也成立了好几个研究中心、研究会等。他的主要著作如《神圣人生论》、《瑜伽论》等在西方著名大学中多列入哲学系必读书目。在我国早已有“天竺三圣”的说法，一为圣雄甘地，政治家，一为诗圣泰戈尔，一为圣哲阿罗频多。甘地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为国父，在世界上以其非暴力运动而闻名，在我国也是家喻户晓；泰戈尔由于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亚洲地区获得此奖的第一人而声誉鹊起，随

后1924年来中国访问，其流云小诗深入人心，影响至为深远；甘地以其政治事功，泰戈尔以其动人的诗篇扬名于世，唯独阿罗频多的超心思哲学不太为世人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好在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本专题的制作即为一个最好的证明。

### 一、生 平

阿罗频多的全称是室利·阿罗频多·高士（Sri Aurobindo Ghose），室利是尊称，通常用以称神或极受尊崇之人。阿罗频多是名，义为“晨开之莲花”，亦称“青莲”或“红莲”，“高士”是姓。

室利·阿罗频多于1872年8月15日生于加尔各答一位医生的家庭，属婆罗门种姓。在他七岁时被送到英国接受教育，最初他在曼彻斯特的一个英国人家里接受私人家教。后来考入伦敦的圣保罗中学学习五年，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1890年中学毕业后获得剑桥大学奖学金，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西方文学。大学期间，阿罗频多对政治发生兴趣，加入了一个由印度爱国学生组织的爱国社团——“莲花剑社”，经常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1893年他21岁时出于对祖国前途的关心，他放弃大学学业，决心结束13年的留学生活，启程回国。回国之初，他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积极参加民族主义运动。他加入国大党，经常发表政论文章，鼓动民众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到他34岁时已为名教授从而被推为大学校长。1905-1908年孟加拉地区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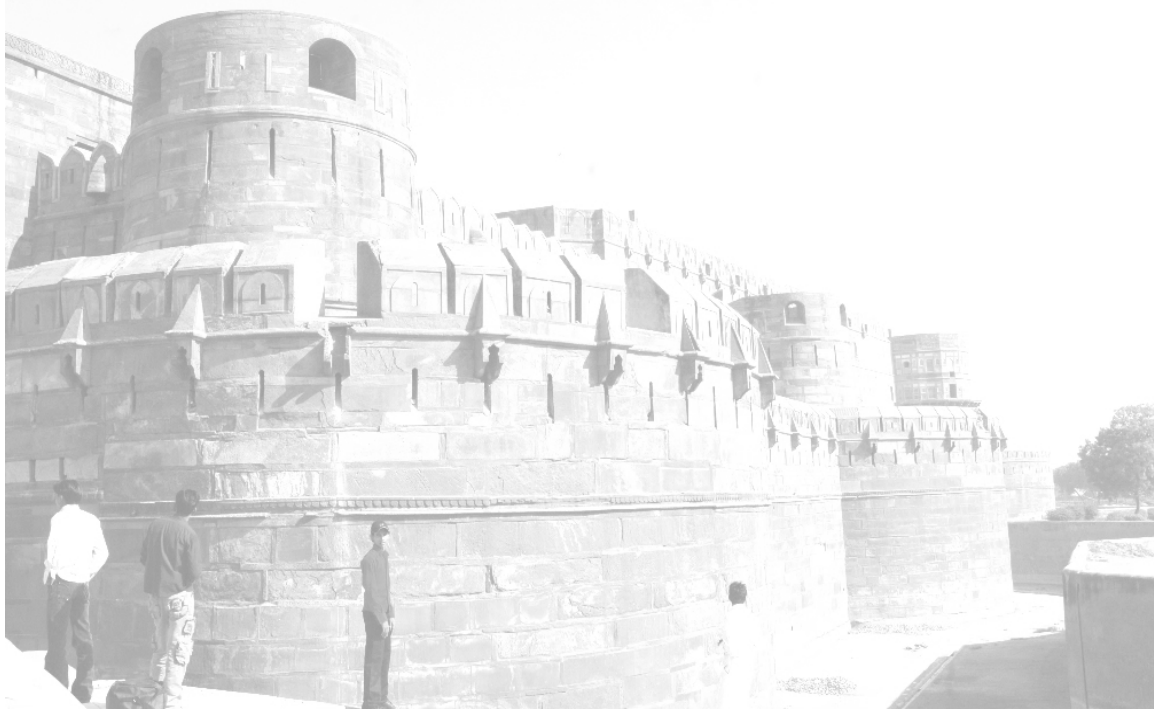
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阿罗频多毅然辞去他在巴洛达大学的教授职务,前往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全力投入反英斗争,成为当时孟加拉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国大党激进派的著名领袖。他主编了《敬礼祖国》报,创办由爱国学生组成的孟加拉国民学院。他号召民众争取民族平等权力,甚至宣扬并主持暴力斗争。此间,他两次被捕入狱。1910年,孟加拉爱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阿罗频多为了躲避殖民当局的迫害,只身来到印度东南海滨的法国属国本第治里(Pondicherry),结束了他17年的政治斗争生活。从此隐居著述共40年,直至去世没有再离开这个地方。

从1910年到1950年他去世这40年间,他虽然从外部活动上基本远离了政治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立说和哲学创作上,但在精神上他与民族独立运动未尝一刻分离;虽然身居法国的属地,但未尝一刻逃脱殖民政府的秘密监视,英政府的与法政府的密探没有一日不在他的附近活动,阿罗频多丝毫不为所动。总之,他虽然在危难期间脱离了革命的秘密运动,但仍然时时心系祖国,谋求民族独立的初

衷未变。只是他不再赞成用暴力和暗杀的手段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标,而采取比较迂回的道路。他知道自己对祖国以至对人类的贡献另有所在,价值更高。

自退隐以后他未尝失去对革命的信心,仍在另一条战线努力工作,从事精神建设。他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办杂志——个人月刊,名字叫《阿黎耶》(Arya,译名《圣道》),每月出版一期共64页,由他一手写成。从1914年起,办了8年。阿罗频多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以分期的形式发表的,像《神圣生命》(The Life Divine)、《瑜伽的整体》(The Synthesis of Yoga)。1921年《圣道》停止出版,但修道院围绕他形成。起初他与四或五位弟子一起生活,但随着修行弟子的不断增加,因此需要生活方面的保证和集体的指导。1914年从法国来了一位精神成就者,即密那·里查德(Mrs Mirra Richard),她资助修道院许多钱,后来主持修道院一切工作,即著名之“神圣母亲”(The Mother)。

到1926年,大师更进一步退隐了,一切院务委托“神圣母亲”办理。其时他刚好54岁,独



居一楼，一般人都见不到他。只是每年有四次机会，参访者鱼贯上楼，在他面前走过，或者一合掌致敬而退。如果有疑问时，写信给他，他都以书面答复。

阿罗频多继续写作和修炼他的瑜伽直到1950年12月5日由于尿毒症复发而去世。12月9日他被埋葬于修道院的庭院里。1968年2月28日，一个阿罗新城(Auroville)形成，这是圣母试图将阿罗频多的思想原则投入实践的结果。

## 二、阿罗频多的整体瑜伽

阿罗频多的精神实践始于32岁时，当时正处于革命运动的高潮。他的修炼是经过印度本土老师指点的，即所谓修瑜伽术，主要是静坐，在早上静坐三小时，在傍晚静坐两小时，辅之以调心、制气之术。其修炼效果显著，半小时可以写诗二百行，文思泉涌，欲罢不能；记忆力大增，体魄刚健，都是修炼瑜伽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然而这次修习没能坚持很久，因革命事业太过繁忙，没有余暇。直到他36岁时即1907年，阿罗频多向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位瑜伽大师毗湿努·跋斯伽·李黎(Vishnu Bhasker Lele)学习瑜伽。李黎在巴洛达会见了阿罗频多，他们一起把自己关在一个住宅上层的小房间中修习瑜伽三天，在跟从李黎修炼了四个月的瑜伽后，李黎认为从此阿罗频多无需他的指教了，便离去了。于是阿罗频多便独自修炼，从此有了若干经验和证悟，他人无从知道。然而全印度渐渐传遍，阿罗频多在瑜伽上有了成就，显现过若干奇迹。

1908年5月，他由于与曼尼克托拉(Manicktolla)炸弹工厂案有关而被捕。在被审问之前他被押在阿里浦尔(Alipur)监狱。在这座监狱里他经历了他感到十分重要的神秘体验。在被释放后1909年5月30日的一次演讲中，他把监狱中的神秘体验解释为他以前只是从理智上认识到的证悟，它“更真实、更行动、更亲切地呈现在他以前领悟到的意识之前”。后来他说

在监狱中他几乎全力研究和修炼《薄伽梵歌》中的瑜伽并沉思奥义书。此后他创办了两份杂志，其中一份是《业瑜伽行者》。1910年2月，他将编务转交给他人，全身心投入到他的瑜伽冥想与沉思之中直到生命结束。在本第治里，他全身心投入瑜伽修习和他的修行法。1914年在4年瑜伽修习而无只字发表之后，开始在其个人月刊《圣道》上发表他的证悟与心得。

阿罗频多此后一直坚持围绕瑜伽及其意义与其弟子进行晚间谈话，但在1926年11月14日另一次重要的体验预示了阿罗频多的瑜伽。这一天他称之为“成就日”(Day of Sddhi)，因为他相信正是在这一天他直接体验了超心思的下降。这一体验据说让他的弟子们确信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超心思下降的必然性。从这一天起，阿罗频多几乎完全取消了一切外在活动，尽管他还与外界保持通信联系。他彻底把管理修道院的任务交给圣母。1926年11月14日因此成为阿罗频多修道院成立的正式日期。

从以上对他研究与修行瑜伽的过程的简述中可以看出，阿罗频多不但自己专心研究古代印度瑜伽经典，而且还拜师学艺并有多次的瑜伽体验。这些无不显示出他继续古代印度瑜伽的一面。但如果仅仅如此，他就不可能成为大师了，如黄心川先生所说他“是在印度传统吠檀多唯心主义基础上，摄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等建立起来的。他把东西方各种互相对立、矛盾的思想囊括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中。”(黄心川：《印度近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2页)他不但有继承，更有创新，在瑜伽方面更是如此。他在研究奥义书和《薄伽梵歌》中的瑜伽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修习瑜伽的证悟，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整体瑜伽”(Integral Yoga；梵文：purna-yoga)。整体瑜伽被誉为从现代印度所产生的唯一的全新的哲学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精神体验的基础之上的。整体瑜伽试图将个人对解脱的追求与人类的进化命运结合在一起。这种瑜伽试图

为当下的全球危机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精神之道，室利·阿罗频多理解为从心思到超心思的转化。

关于“瑜伽”一词，按照阿罗频多的理解：“是一种趋向自我完善的有条理的努力，其方式是通过表现其存在的潜力和个人与宇宙、在宇宙中表现出来的超越性存在（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合一。”这样的瑜伽可被看作“将一个人的进化浓缩为唯一的生命或身体存在几年甚至几个月的方式”。

阿罗频多的整体瑜伽并不拒绝身体，通过把它拉回到精神的深层以避免身体的惰性。身体也是进化世界的神圣精神的一种形式，而且任何一种厌恶身体的形式最终都会远离神圣者自身。瑜伽的目标是人的本性和意识所必需的、彻底的转变，它是能够治疗人类疾病的唯一良药。这种激烈的转变是把人类的意识从心思的层次提高到超心思的层次，是一种“三次转化”。第一次转化是一种“心灵转化”，定义为“把我们现有的全部性质转化为一种灵魂的工具”。这是由瑜伽的修炼所带来的变化。第二次转化是一种“精神转化”。瑜伽是一种个人意识的集中从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而“精神转化”是新近获得的高层意识下降到生命和身体较低的层次以转化它们。精神转化通过让低层次的本性准备迎接超心思的最后下降，从而为第三次转化提供了舞台。因此，心理转化过的意识提升了生命与物质的低层次。第三次转化是“超心思的转化”。这次转化是前两次转化的结果。一定有“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意识的永恒上升和从高层次向低层次性质的有效的下降”，然后超心思才下降。只有超心思下降了，全部的个体存在才会转化它的性质、能力和运动。阿罗频多所提出的瑜伽试图为三次转化做准备的。正是上升首先导致“心灵转化”。由于进化中的神圣者并不厌恶肉体，不忽视身体，阿罗频多才提出了转化身体的瑜伽。由于一切都被神圣者转化，阿罗频多的瑜伽关注的是物质与精神不加区分的宇宙每一要素的转化。阿罗

频多的瑜伽因而是其终极关怀的目标，是直接由他关于宇宙中神圣者和瑜伽试图加快的进化的观点引发的。

他称他的瑜伽为“整体”瑜伽有几个原因：首先，它试图转化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精神或身体，因此是整体的。其次，它包括“奉爱、知识和工作三种途径”的瑜伽，即奉爱瑜伽、智瑜伽和业瑜伽的整体，因此是整体的。它把这三种途径看作一种。与传统瑜伽相比，他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全新的方式：

“我从未说过我的瑜伽的所有要素都有全新的标记。我把它称之为整体瑜伽，那是说它采纳了古老瑜伽的菁华和许多方法——它的新表现在它的目标、立场和其方式的整全上。”他认为其创新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他的立场不是远离世界和生命，而是生命和一切存在的一种转化。它的目标不仅是只是为了个人的实现，而是为一切地球意识形式的转化“带来一种意识的力量（超心思）”。它的方法是整全的，与只期待在心思或精神上发生变化的片面方法形成对照，是一种整体的方法。

他指出它是整体的第三个原因。由于它是整体的，它的行法和步骤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体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进行修炼。因此阿罗频多只是提出应遵循的宽泛的准则，而没有提出有约束力原则或规范。由于其方法是整体的，所有人的存在和性情都被接受为过去进化的结果，并且一切都不得不经神圣的转化。而且由于瑜伽是整体的，生命的一切都是它的方式。生命中的每一种体验都可用于转化，并且每一种精神体验都是通向完善之路的一部分。因此，它被称为整体的在于：它把生命中的一切都包括进它的方法中。总之，它的方法和结果都是整体的。

但瑜伽的目标不仅是导致心理转化的上升，它还是高层次的下降以改变低层次的；它不仅是意识的内向运动，还使内在的承担外在的：“瑜伽的目标是向神圣者敞开意识并越来越远离外在生活而生活在内在意识之中，把最



内在的精神呈现出来并通过精神的力量来净化和改变存在者，以致它会为转化做好准备并与神圣的知识、意志和爱合一。”

阿罗频多在其《瑜伽书札》中提出了修习整体瑜伽的一些基本要求。这些是总体要求，因为整体瑜伽并没有规定适用于所有人的修炼的具体规则。第一个要认识到一个人有趋向成就的“召唤”。想要在趋向完善道路上前进的人一定会感受到内在神圣者的运动，一定有一个“积极的内在的召唤”。这种召唤是重要的，因为当一个人心思、生命或身体疑惑时它会支持他。

阿罗频多把真诚作为修习瑜伽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一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执着于真理。因此在瑜伽中所实施的一切行为都要与瑜伽行者的理想相一致。理想本身“应该是真理的彻下降和世界上没有虚假”，应该是“警醒、坚定和不停”。第三个条件包括渴慕神圣者和向神圣者拜服，做正确的事情。应该对神圣者葆有信仰，无论有多少多大困难，神圣者都在指引一个人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崇拜。这个条件直接与信仰相关。“崇拜就是把自己交给神圣者——把曾经是或拥有的一切交给神圣者并且认为自己一无所有，只听从神圣者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命令，只为神圣者而生活而不是为自我。”

阿罗频多采纳了传统瑜伽：智瑜伽、业瑜伽和奉爱瑜伽并把它们整合进他的整体瑜伽中。整体瑜伽并不强调其中的一种，而是整体并包容了它们三个。一个人可以从其中任何一种开始，但他需要发现它与其它两种瑜伽相遇合之处，起初三种瑜伽平行发展，然后逐渐自然地体验到它们三种，因为它们是融合为一的。

在整体瑜伽中，智瑜伽是一种知识和冥想的方式。这里的知识是一种整体的知识。通过冥想这个世界得以肯定而不是被否定。整体智瑜伽带来一个人意识的内向化，认识到神圣者的作用和宇宙的本质统一。一种整体智瑜伽使

一个人感受到更高一层的真实，带来一种整体的视野。这样一种视野不仅仅增添新知识，它还使一个人不再局限于有限的自我，使他认识到了一与无穷。

在整体业瑜伽中，修习者在做着世界的工作时要改变他的态度和动机。这种瑜伽强调的是意志。其理想状态是生活在神圣者之中而不是自我之中。“舍弃我们工作上的一切自私目的”。在这样做时，一个人就会平等对待一切事物，因为一切事物和人都是神圣的，一切行为和运动都是神圣者的行为和运动。平等不是冷漠，它最终会成为一种博爱，干什么都快快乐，为一切人而快乐。一位瑜伽行者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一种不考虑个人得失的态度去做。要做到这些，需要有三个主要的步骤，第一，一个人要把他的所有工作都奉献给神圣者。第二，他要舍弃个人对他所做工作成果的贪恋，他只追求一个结果：自我完善。第三，他要摆脱自我是一位工作者的意识。业瑜伽作为整体瑜伽的一部分是把智瑜伽的真理运用于生活。

“整体瑜伽中的奉爱将是把神的概念普遍化，通过一种多样化和拥抱一切的关系使其人格化，使他不地地奉献给一切存在者并奉献、舍弃、交出整个的存在给他，以致他将栖居在近处，在我们中，我们与他在一起，在他里边。”这种奉爱本质上就是在一切事物中看到神圣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看到神圣者。提升到最高的意义上，这样的爱就是一种喜乐，一种爱与被爱者超宇宙的合一。通向完善的道路就是这种整体瑜伽的目的。

正像徐梵澄先生所总结的：阿罗频多“在旧的智识，敬爱，行业三大系瑜伽中，特重‘行业’；要工作，无论高低，由工作即‘行业’而见道，空心静坐不为功。而特表‘超心思瑜伽’，是至极向上一路的契入。即与宇宙间至真至上者合契。视整个人生为瑜伽。”（《周天集》译者序）如徐梵澄先生所说：“瑜伽与宗教是迥乎不同的两回事”，瑜伽“义为‘契合至真之道’，是一种精神实践之学”。“将其统摄入宗教是世俗误

解,它与宗教有天渊之别。”(《陆王学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页。)正如阿罗频多的整体瑜伽所昭示的:“它的目的,不在于出离世界与人生而入‘涅槃’或‘天国’;乃在于转变生命和存在,非当作偶然或附有底事,而是作为分明底中心目标。”(《瑜伽的基础》的“题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三、阿罗频多与中国

阿罗频多自幼留学英伦,深研希腊古典,回国后又深研印度哲学,因此在世界三大文明希腊—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中,他至少对前二者都很精熟,唯独对于中国这一文明系统由于语言的隔阂而少有论及。但让人深感兴味的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知灼见。

阿罗频多在与他的弟子一起讨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时,曾谈到过中国历史文化:

弟子:这是很奇妙的事儿,斯宾格勒未尝见到这一事实,即会有民族的复兴和觉醒。

阿罗频多:是的,以中国为例。中国自古就有了城市。这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总是被侵扰而又总是保持不变!如果你研究中国千年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在骚乱中仍保持他们的文化。蒙古大汗试图以烧毁他们的典籍来破坏他们的文化,但是没有成功。这就是这个民族的品格。如果在目前这场骚乱之后,甚至在两千年之后,你会发现他

们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精神。对此我毫不怀疑。

对中国历史有这样清醒的观察,在当今世界思想家中很难找到。

提到阿罗频多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就不能不提及徐梵澄先生。在长达50年时间里,徐先生把阿罗频多的主要著作先译成汉语出版,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出版的计有:《教育论》(1956)、《瑜伽的基础》(1958)、《综合瑜伽论》第一部(1959)、《综合瑜伽论》第二部、第三部合订本(1959)、《瑜伽论》实为《瑜伽书札集》(1960)、《社会进化论》(1960)、《玄理参同》(1973);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神圣人生论》(上下卷)、《瑜伽论》即《综合瑜伽论》第四部(1987年)、《薄伽梵歌论》(2003)、《周天集》(三联书店,1991年,摘自阿罗频多著作的精炼简短之言)。此外,早在1954年徐先生使用文言编著了一本小册子《室利阿罗频多事略》在香港出版。徐先生举个人之力,用几十年的心血将阿罗频多的主要著作译成汉语,其中有深意存焉。

希望在21世纪中印两国携起手来,在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同时,两大古老文明的思想文化交流达到佛教之后的第二个高峰。

